

祝勇作品系列

国学与五四

饮风楼读书记第一卷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祝勇作品系列

国学与五四

饮风楼读书记第一卷

祝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与五四：饮风楼读书记·第一卷 / 祝勇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1
(祝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7990-7

I. ①国… II. ①祝…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6086 号

国学与五四：饮风楼读书记第一卷

(GUOXUE YU WUSI: YINFENGLOU DUSHUJI DIYIJUAN)

作 者：祝 勇

策 划 人：张 杰

产品经理：陈丽娜

责任编辑：陈丽娜

责任审校：张海静 童 瑜

书籍设计：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吴玉萍

责任营销：何 遥 010-85924690

投稿信箱：tougao@rmdf.cn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9.625

字 数：19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990-7

定 价：39.80 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国学与五四



祝勇在北京 2004年 鄂力摄

谨以本书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

自序



我不是学哲学和思想史出身，本书也算不上什么论著，只是我的读书心得而已——准确地说，是我的学习作业。这并非谦虚，而纯属实言——前半部分关于国学的文字，是我当年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作业，当时全部是手写，本来不打算出版的。此番应东方出版社之邀编辑作品系列，遂整理一过，虽美其名曰《国学笔记》，实际上只是沾了一点皮毛。国学浩瀚无边，在故宫，站在《四库全书》面前，面对林林总总的经史子集，我一下就失了底气，觉得生命如此短暂，连这一部大书都读不完。所以，在《国学笔记》这个美名之下，是其实难副。身为国人，不懂国学，让我感到有辱国格，只是人近半百，想痛改前非也难了。

《五四笔记》写得更早，成于1999年。关于它的写作经过，该篇题记均已讲明，这里只想说，虽然这两篇笔记写作时间不同，各自成篇，但组合在一起，也别有妙处，因为在20世纪，双方

互相成了“他者”，彼此纠缠，也彼此成就，对照起来看，才看得完整。

阿城说：“在中国，一个哲学，一个历史，都是一生做不完的学问，而且注家如蚁，派别林立，板儿砖如雨，有硬伤立刻出局。”我写下这篇自序，或许是要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不至于成为大方之家攻击的靶心，但转念一想，我本非局中之人，又何怕出局呢？

这些文字，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 connected strokes.

2014年8月29日写

9月4日改

目录



1

自序

1

上篇	《诗经》	3
国学笔记	《礼记》	16
	《论语》	32
	《孟子》	43
	《中庸》	48
	《大学》	54
	《老子》	60
	《庄子》	72
	《墨子》	88

141

下篇	题记	143
五四笔记	第一节	148
	第二节	154
	第三节	164
	第四节	171
	第五节	175
	第六节	178
	第七节	183
	第八节	203
	第九节	214
	第十节	223
	第十一节	229
	第十二节	239
	第十三节	264
	第十四节	271

273

附录

致祝勇	王元化	275
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王元化	276

上篇



国学笔记



《诗经》

人类学家雷法斐 (Robert Redfield) 曾经把人类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 分成大传统 (great tradition) 与小传统 (little tradition)。余英时说: “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 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1] 尽管实际情况与学术概念相比远为复杂, 但余英时认为: “大体而言, 上述的二分法还是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架构。”^[2]

《诗经》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 众说不一, 这还需从其成书说起。众所周知, 《诗经》原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经孔子搜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第 129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 同上。

集整理裁定，编为《诗》，或名《诗三百》，战国晚期，才以“经”称之，至两汉，方有诗经学建立。关于《诗》的成书过程，《史记》有明确记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

由宋诗之官采集编攬而成，而《雅》《颂》则分别是记载王朝宴乐以及祭祀的诗歌，由朝中士大夫完成，无须采集。

对此，扬之水持有异见，她认为：“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2]关于《风》，她特别指出：

《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闾，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会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

[1]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5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扬之水：《诗经别裁》，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芣》说到“公侯之宫”“王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饮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邶风·君子偕老》《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猗嗟》《卢令》《秦风·驺虞》等等，《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是庶人与奴隶。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贱役也，然而通观全诗情调，却实非贱役者言。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豳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谁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民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1]

[1] 扬之水：《诗经别裁》，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扬之水否认了《诗》（至少是《风》）出自小传统的说法，而将其归于大传统，即贵族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的产物。作为诗经名物专家，她执著于以实证说话，从《诗经》的起居服用中，推测作者的身份仪容，而且《诗经》，即便是被列为里巷歌谣的《风》中，也确如扬之水所说，不乏宫室、车服、器皿之名，见证着上流社会的华美生活，但亦不乏下层人民的呼号。如果说对华美生活的描摹不属于庶人与奴隶，那么下层人民的切肤之痛亦非士大夫可以伪造，此如嘲笑剥夺者的《伐檀》《硕鼠》，讽刺君王（齐襄公、文姜）荒淫生活的《南山》《载驱》，对沉重徭役表达愤怒的《东方未明》，而咏叹戍卒生活悲苦的《采薇》，具有反战色彩的《鸛羽》，使我们依稀看到唐代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与之的承继关系。即使《芣苢》这样在乡野阳光中迸发的天籁之声，在穿越数千年时光后依然一尘不染，清澈透亮，如果说“诗咏志，歌咏言”，那么这种志与言，决非轻车裘马的贵族士大夫可以有之。那种清纯质朴之风，亦为民间独有。《诗经》的人民性、民间性，恐没有办法无视。因此，孔子论《诗》时才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兴者，譬喻也；观者，观察也；群者，聚集也；怨者，批判也，此皆与下层民众的情感与表达相通。熊十力说：“三百篇实以小民忿怨君上之词，为主要作品，此中君上，通天子诸侯大夫而言。”^[2]“夫以天下小民之哀

[1] 《论语》，见《论语·大学·中庸》，第21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2] 熊十力：《原儒》，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第48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吟，而尊之为经，昭然与天地日月同其不朽，岂是寻常意义哉！六经皆有传，孔子诗传虽亡，吾人犹可想见其为民主思想及社会主义之异源。”^[1]

至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之说，自可商榷，而以陶渊明的田园诗类比《诗经》，亦不贴恰，因其“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感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况且，扬之水之说，与周官采诗的史实，与《史记》《汉书》等有关孔子采集编修《诗》的记载，乃至《诗经》文本中若干诗篇的口径，颇多矛盾之处，倘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权作一家之言，立此存照。至少，《诗经》是一部作者、题材、视角多元的作品，不能定于一宗。

余英时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2]也就是说，大、小传统之间，不是一种对峙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小传统经过官方的采集升华，可以成为大传统的一部分；而大传统，通过教化，也可以溶入小传统中去。

而且，如刘梦溪先生所说：“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大传统更具有稳定性。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

[1] 熊十力：《原儒》，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第48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1] 所以才有“礼失，求诸野”的传统，或许，《诗经》中叙述身份和叙述角度的多元混杂，刚好为大、小传统的相互渗透提供了证据。

二

孔子为什么对“诗三百”倾注如此心力？清人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 用吕思勉先生话说：“先秦之书，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3] 古书之稍近于史书说，只有《周书》等少数，《史记》开辟的史书传统始于汉代以后。因此，先秦时代大量的历史信息，皆留存于“六经”之中。《史记》中记载的三皇五帝事迹，《大戴礼记》中早有记载；《易·系辞传》中对伏羲氏的记载，则至为详尽；《诗》亦不例外，比如《史记》中对公刘的记载甚少，而《诗经·大雅·公刘》，则是一篇关于公刘的史诗，具体而微，真切生动，而且是原生态，可与《史记》互相参阅，读之，才能体味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的真义。

据说，“六经皆史”的说法倡自王守仁。《诗》为“六经”之一，所以，它既是诗，是经，也是史，记录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

[1] 刘梦溪：《论国学》，第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吕思勉：《先秦史》，第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